



01

Andreas Mühe: Between Reality and Stage Scenery

安德列亚斯·穆埃： 介于真实与舞台布景之间

图 / 安德列亚斯·穆埃 (Andreas Mühe) 文 / Lucy Lu

作为庆祝中德建交45周年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2017年9月“德国艺术在中国”即“德国8”展览，吸引了65万名观众，关注人数达500万。七位极具国际声望的德国现代艺术代表人物，在北京民生美术馆举办摄影展，包括贝歇夫妇 (Hilla und &



安德列亚斯·穆埃 (Andreas Mühe)，Florian Büttner 摄



02

01 | 意大利驻德国大使安东尼奥·普里·普里尼招待会 (Antonio Puri Purini, 2005 ~ 2009 年在任), 2009

02 | 托提拉斯 (Totilas) II (国际马术大赛常胜冠军, 盛装舞步之王), 2013

Bern Becher)、安德列亚斯·古斯基 (Andreas Gursky)、康迪达·赫弗 (Kandida Höfer)、托马斯·鲁夫 (Thomas Ruff)、托马斯·斯特鲁斯 (Thomas Struth)、卡特琳娜·西尔维丁 (Katharina Sieverding) 等名家。还有一位就是安德列亚斯·穆埃 (Andreas Mühe), 其作品《勃兰登堡门前的德国总理科尔》让人备感苍凉, 难以忘怀。除了与德国顶级大师比肩之外, 他的个人经历非常励志。他有摄影实验室专业技师背景, 虽无大学学历, 但文学及艺术修养极为深厚, 可称为自学成才的典范。

德国领导人和世界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曾被穆埃摄入镜头。如德国前总理科尔、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布什、德国总理默克尔。他曾被贴上

“总理御用摄影师”的标签, 曾经在柏林前犹太女子学校举办摄影展, 对历史进行反思, 尤其是他拍摄的关于纳粹专制和德国统一的作品, 在德国和国际上引起了一定反响。在关注历史题材的同时, 他还拍摄了《森林》系列体现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引发人们思考; 以1979年到2016年自家圣诞树为拍摄对象的《圣诞树》系列作品, 则表现他对传统与家庭的重视与回归, 让人们在竞争激烈并日益冷漠的社会中感念一份温暖和美好。

另外, 在著名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德国影片《窃听风暴》(又译《别人的生活》, *Das Leben des Anderen*, 2006) 中, 饰演前东德特工的男主角乌里希·穆埃 (Ulrich Mühe, 已于2007年去世) 是他的父亲, 也是他的艺术启蒙者。

初看穆埃的作品，其实并不好理解为什么他在不到40岁就能在德国摄影界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当我们走进他的作品，了解其背后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就能发现，他的成长背景以及他对德国近代史、统一进程和当下德国发展的思考都在影响着其创作，也是理解他作品的切入口。以下，我们通过采访，来寻找他之所以成为当代德国摄影代表人物的理由。

您在卡尔·马克思城出生(即今开米尼茨, 25万人口, 是萨克森州排名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后的第三大城市, 1953~1990年沿用此名), 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无人不知, 请讲讲来自艺术世家的您的成长过程、出生地和创作渊源?

安德列亚斯·穆埃: 我的出生地和我的艺术创作息息相关, 对我影响深远。富有艺术气息的家庭对我的艺术启蒙至关重要。开米尼茨在19世纪末已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被称为“欧洲东部的曼彻斯特”, 有很多大型纺织工业和机械制造业, 因此二战末期遭轰炸而被严重破坏。人们在被毁的城市中心地带建起一座社会主义城市, 只有少数建筑被保留及重新装修, 例如老歌剧院。我生平第一次进入这所艺术宫殿时, 看到舞台上王子登场, 我便大叫“爸爸”, 因为那时我年轻的父亲在芭蕾舞剧《灰姑娘》(*Aschenbrödel*)中饰演王子。

我的父母毕业于莱比锡戏剧大学(Theaterhochschule "Hans Otto" Leipzig), 是卡尔·马克思城的戏剧演员, 母亲很想念莱比锡, 和她丰富多彩的朋友圈及城市开放多元的文化。

我们常在城堡、山谷和埃尔茨山区郊游; 很多爱好我至今依然保留, 尽管我们几年后搬到了柏林, 但直到今天, 我依然和我的孩子们定期去埃尔茨山区旅行。1989年, 我还在上小学, 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我还没来得及学习。我还记得在那里有巨大的40吨重的马克思头像, 设计师是列夫·凯尔伯(Lew Kerbel), 这座头像在创作《A.M. 一次德国旅行》系列时也被我摄入画面。

离我们柏林居住地不远, 是1980年代新建的台尔曼公园(台尔曼, Ernst Thälmann, 德国共产党领导人, 魏玛共和国政治家), 里面的台尔曼纪念像也是由列夫·凯尔伯创作的。这里是来柏林的旅游者, 尤其是那些想追寻东德历史的人们喜爱的地方。在马丁·路德宗

教改革纪念日后, 又迎来德国自由思潮诞生200周年纪念日, 有太多还没有被消理解的东。西。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经常被引用的句子我也非常熟悉, 即“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和人物, 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 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我非常认同。

作为德国摄影界的代表人物, 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摄影为职业?

安德列亚斯·穆埃: 中学时, 可以自由选择为期两周的社会实践, 让我们了解和体会不同的职业。我选择去体验当摄影实验室技师。专业技师培训毕业后, 我一直在摄影实验室里工作, 无论其兴衰, 忠实于这个行业, 从未离开。所以, 我在偶然的职业实习中找到了理想工作, 而且是终身职业。

2017年9月的“德国8展览”展出了53幅当代大师的作品, 请您谈一下参展过程? 您如何评价杜塞尔多夫学派?

安德列亚斯·穆埃: 这涉及到战后民族社会主义中断的摄影传统路线问题, 杜塞尔多夫学派在德国战后是摄影方向性变革的先驱, 贝歇夫妇影响了在其门下学习的整整一代摄影人。新客观主义即他们重新向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回归, 我也向其理念靠拢, 并且贝歇学生们在艺术界的地位和未来发展都让我非常看重并怀有深深的敬意。从策展人角度出发, 我和卡特琳娜·西尔维丁女士的参展是要形成鲜明对比, 策展的关键点是要展示197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学院派的摄影作品及创作方式, 让大家有一个直观印象。

您的作品通常会让人们想到舞台场景, 为得到一幅设计完美的画面, 从构思到洗印, 你如何做到导演、演员以及摄影师的角色统一, 并成功捕捉自己的理想画面?

安德列亚斯·穆埃: 通常我自己对拍摄对象或创意进行加工, 沉浸其中, 并且给自己时间来整理、思考, 有时会投入很长时间。我会和几个精心选择、但与我关系不太亲近的人一起讨论。有时我会固执己见, 独自创作。很多创意常常是被一再否决后又重新提出, 或被搁置, 然后又拂去灰尘重启。创意后期才是安排时间表、

参观或实地察看、材料制作、拍摄许可申办、洽谈及创作。

我有一个小团队，他们在配角选择方面极为精心。如果拍摄对象是多个人的话，谁站在相机前不用我亲自定，但是人们的姿势和神态必须要让我信服，我倾向于和熟悉的团队合作。等这一阶段完成，我对外界的评论完全不再感兴趣，但会考量可能出现的结果。我会在漫长的工作环节中分步骤推进，然后才是最终拍摄。

人们从您的某些作品中感觉到“弗里德里希式”忧郁，这些作品是否确如外界评论所言，受到浪漫主义绘画影响？

安德列亚斯·穆埃：在格林童话中有个非常简短的

童话《星星金币》：一位贫苦孤儿，除了一块面包，一贫如洗，但在大自然中遇到了很多比他境况还糟糕的人，于是他就把面包和身上的衣物分给了更需要的人。上天为了奖励他，让金子做的星星掉落到他面前，又送给他一件亚麻衬衫遮蔽身体，他可以把金币藏在口袋里，从此生活富足。

人类在大自然中是十分孤单的，一切要靠自己。不论白天和黑夜，日出与日落，也不论在森林深处、山谷里、湖泊旁或大海边，都是如此，与时间和地点无关。

有时我会对人物比例进行戏谑式的演绎。人像在自然中非常小，几乎就是风景中的一个点，然后人像变大，但是与自然相比永远不能同等大小或同样重要。如

03 | “新浪漫主义”系列之一（*Neue Romantik*），《白垩岩》（*Kreidefelsen*），2014



果谁尝试那样做，就必然会遭遇失败。

我非常关注贝希特斯加登（das Berchtesgadener Land位于南德，因希特勒的“鹰巢”在此而闻名）地区的风景，那是我的风景胜地。德国知名画家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 著名油画有《吕根岛的白垩岩》）曾让他的学生去那里，将其风景速写下来，作为他在家作画的素材。虽然他从未去过那里，但是那里对他而言是一个让人神往的胜地。并且，贝希特斯加登也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地区。而当停留在那里时，这样的风景不仅会让我深深沉醉，还能感觉到这里有种令人窒息的美。

您是两德统一的历史观察者，但对中国观众来说，由于不知道一些作品的历史背景，便不太容易理解。如《上萨尔茨堡》系列（*Obersalzberg*），您当时想如何创作这一反思历史的题材作品？

安德列亚斯·穆埃：如果提到两德统一的历史观察

者，同时也意味着应该对纳粹专制及德国当代历史的后续影响进行反思。Obersalzberg 和Wandlitz（两地区曾被纳粹占据并划为禁区）都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和此地的美丽风景无关，那些研究特色旅游项目的人称之为“黑色旅游”（Dark Tourism）。人们去到Obersalzberg 和Wandlitz这类令人惊悚的地方，是因为这里曾经记录历史。战争失败，德国必须承受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进行思考，同时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庆幸。尽管战争结束后，大多地方已是废墟，但人们还是想把最后可能见到的所有历史痕迹都消除。因为人们心里知道，希特勒一年当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并沉醉于其间，而且只是知道就够了。

Obersalzberg是肮脏的，这也是我的主题。年轻人穿着式样美观的军服在美丽的风景中小便并且拍照，然后是纳粹军人穿军装向长官敬礼，最后脱下军服赤裸身体重复这些动作。以上就是与此系列相关的素材，由海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 希特勒的战时摄影师）和瓦尔特·弗瑞茨（Walter Frenz, 电影制片人，希特勒摄影师）提供。

有书面记录，希特勒的姿势和具体动作都是为演说精心排练过的。这还可见于贝托德·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的戏剧《阿图罗·乌伊发迹记》（*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des Arturo Ui*）中的一个情景，阿图罗·乌伊要和公众前教他如何演说的一个演员见面。另外还可见于丹尼尔·列维斯（Daniel Levys）拍摄的讽刺电影《我的元首》，我父亲——演员乌里希·穆埃——饰演一位犹太演员，他希望他和家人能够避免被送往集中营而死亡命运，因此同意帮助精神濒临崩溃的希特勒在公众前发表演讲。希特勒由喜剧演员黑尔格·施耐德（Helge Schneider）出演。这部电影与查理·卓别林1940年拍摄的伟大影片《大独裁者》有共同之处。同样的电影还有1942年拍摄的由恩斯特·鲁贝驰（Ernst Lubitsch）导演的电影《生死之间》（*Sein oder Nichtsein*），也是讽刺影片，主题是对希特勒代表的纳粹专制进行嘲讽，与活着的希特勒进行抗争。对于这段历史，新生代面对起来会觉得更困难，不久前这段历史在德国还是禁忌，将来对下一代来说可能会消失殆尽，而我们这一代必然会为此纠结。

04 | “上萨尔茨堡”系列之一（*Obersalzberg*），《贝蒂》（*Betty*），2012





05 | “德国森林”系列之一 (*Deutscher Wald*)，《森林3》，2016

对摄影师来说，拍摄政坛人物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您的照片通常有多重含义，政治人物照片背景的选择到底出于何种考量，如科尔总理的拍摄背景是勃兰登堡门，而默克尔总理是自然环境？

安德列亚斯·穆埃：科尔 (Helmut Kohl) 成为当时西德总理时，我在东德，还不到3岁。当昂纳克 (Erich Honecker, 前东德主席) 会见科尔时我8岁，柏林墙倒塌时我10岁。从科尔到默克尔的时代对我的生活影响至深。我一共为科尔拍摄了两次，第一次是2009年德国统一20周年庆典时，在场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和乔治·布什。三位政府首脑作为德国统一的奠基者，在一块柏林背景墙前留念，五年以后是同样的庆典。“德国勃兰登堡门”是“德国统一”的近义词。照片中，科尔在东德这一侧注视着建筑，尽管在另一侧晨光微曦，他的时代

早已终结，耀眼的光线将他和轮椅的影子映得长长的。

我拍过默克尔很多次，那张照片是在柏林勃坦尼斯园 (Botanischen Garten) 拍摄的。我的朋友和资助人 F.C. Gundlach (同时也是著名的摄影师和收藏家) 写道，默克尔站在树木中间，像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一样，这对在世界政坛赢得一席之地的默克尔来说，是非常美好的描写，对我来说也是。

在《A.M. 一次德国旅行》作品中，人们感受到您的幽默，为什么您想实施这一拍摄计划？（在这个系列中，穆埃邀请了一位模特扮演德国总理默克尔，拍摄了她乘车观看德国标志性景观的画面）

安德列亚斯·穆埃：人们在我身上贴上“总理御用摄影师”的标签，我非常想从中摆脱出来，就决定让人



06

们“猜画谜”。在这视觉迷面中隐舍多个层次。我们的姓名缩写是一致的，A.M.的缩写可以是安格拉·默克尔，更绝对应该是安德列亚斯·穆埃（Andreas Mühe）。画面让人有一种在总理车上拍摄的错觉，这一系列照片是她乘车到吕根岛的白垩岩地区或者在楚格峰地区视察等类似的情景。人们看到照片会以为真的是默

克尔，但其实并不是。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照片中出现的场景都是和德国历史相关的地方，这些“默克尔”透过其豪华座驾的防弹玻璃看到的情景，都是有历史故事的。而在开米尼茨马克思头像前，拍摄“默克尔”的目光在婴儿车上停留的那一刻，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07

06 | 《安格拉·默克尔“在树下”》(Unterm Baum), 柏林, 2008

07 | “圣诞树”系列之一(Weihnachtsbäume), 《圣诞树 2010》, 摄于 2016

08 | Florian Büttner 摄

借“圣诞树”系列您将令人温暖的美好时刻永驻,可否讲讲一直以来支持您的人的名字或者人生转瞬即逝的美好时刻?

安德列亚斯·穆埃: 37株圣诞树同时也是我人生的一部传记。非常幸运的是,我早年就认识了F.C.Gundlach,他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

“德国8”展览中,您的作品和有国际声望的贝歇夫妇、安德列亚斯·古斯基、康迪达·赫弗、托马斯·鲁夫等名家的作品一起在中国展出。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您是否会觉得肩负更大责任或者倍感压力?

安德列亚斯·穆埃: 身体力行去尝试。这是我家族的生活信条,我一直按此行事,放手去做。

中国很多摄影师很看重最新或最贵的相机,作为一位至今依旧使用胶片机的摄影师,您有何看法?是否可以谈谈新年的艺术创作计划,中国

也许在您的创作计划之内?

安德列亚斯·穆埃: 我像以前一样还是用胶片机。当然我在某些旅行或郊游时会带一部数码相机,也会拍快照。我也喜欢在大量照片中留住美好,我尝试每年都为家庭制作一部传统的相册,这样做出于恐惧或者担心,因为拍摄的很多照片最后都没有保留下来,但今年我没能做到。

去年我曾多次去过中国,如果能与中国艺术界进行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我当然会非常高兴。通过“德国8”展览的交流,我了解到中国很重视高素质的教育,所以关于最新技术和新型相机的问题,作为生活在落伍的欧洲的我恐怕未必有资格回答,而且我也不会面对类似问题。中国会在我未来的拍摄计划之中,这个国家里发生的变革让世人惊诧,并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新的一年,首先我要尽快完成德累斯顿森帕歌剧院的拍摄,并将我的出生地、家庭和故乡的繁复拍摄工作做完。📷



08